

# 为“司母戊鼎”正名

李保富<sup>1</sup> 孟凯<sup>2</sup> 李沛儒<sup>3</sup>

1. 藕堂古文字方言研究院, 中国·山西 太原 030012
2. 山西傅山书画院, 中国·山西 太原 030001
3. 山西浩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山西 太原 030002

**摘要:** 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商代大鼎, 其铭文于1946年被释读为“司母戊”, 该称名被官方机构沿用并引发八十多年学术争论, 核心焦点为铭文中首字释“司”还是释“后”, 且学界将铭文中相关字符拆分为“母戊”训释, 造成对大鼎内涵的认知偏差。本文运用古文字学、方言学、训诂学、文献学等跨学科方法, 对大鼎全铭文进行综合考证, 厘清“司”与“后”的字源关系, 重新训释相关铭文字符, 并为该大鼎作出符合字源与历史语境的正名。  
**关键词:** 司母戊鼎; 铭文考释; 古文字; 后(司)威鼎

## The Rectification of the Name "Si Mu Wu Ding"

Li Baofu<sup>1</sup>, Meng Kai<sup>2</sup>, Li Peiru<sup>3</sup>

1. Jiangtang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Dialects, China Shanxi Taiyuan 030012
2. Shanxi Fu Sha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cademy, China Shanxi Taiyuan 030001
3. Shanxi Haobo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 Ltd., China Shanxi Taiyuan 030002

**Abstract:** The Shang dynasty bronze ding unearthed in 1939 from Wu'guan Village, Anyang, Henan, was inscribed with characters deciphered in 1946 as "Si Mu Wu." This name has been officially used for over eighty years, triggering prolonged academic debate. The central dispute lies in whether the first character should be read as "Si" or "Hou," and in the conventional segment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into "Mu Wu," which has led to a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vessel'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eaning. This paper appl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y—integrating paleography, dialectology, exegesis, and philology—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full inscription. It clarifies the etym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i" and "Hou," reinterprets the relevant characters, and proposes a revised name that aligns with both linguistic origin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Keywords:** Si Mu Wu Ding; In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Hou (Si) Wei Ding

### 1 大鼎的学术研究历程

解放前夕, 金石学研究持续发展, 考古学与甲骨学的学术影响逐步显现。1946年10月27日《申报》刊发《安阳探古 殷代祭器出土记》, 对安阳武官村出土商代大鼎进行报道并使用四种称名, 学者张凤基于此报道, 于1946年11月17日在《中央日报》第十版发表的《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 对报道中的称名提出异议, 首次将大鼎铭文释读为“司母戊”, (大鼎及铭文见图一、图二)。释读方案被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2010年之前)相继沿用。

1962年, 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金祥恒在《释后》中提出:“甲骨文、金文中以前读的‘司’字, 应该释为‘后’, 表达的含义应该是‘发号君令’的人。因甲骨文求对称, 常常正反书之, 其实为一字。左右对称, 故司之说解为臣事于外者, 与后发号者君后也, 其义一之与

二也。许氏不见真古文, 不知为一字, 强分为二, 而易其说解。”



图1 司母戊鼎

1969年, 台湾学者丁骥在《说后》中, 也对甲骨文的‘司’与‘后’字源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两个字原本是一个字, ‘司’是本字, 而‘后’是假借字。‘司’假借为‘后’的情况只适用于称呼母, 如‘后母戊’, 表

示尊崇的意思。”



图2 鼎内铭文

1977年在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会上唐兰先生云：“后辛二字见于石牛颈下，后字写如司，有人就读为司辛是错了。春秋时叔夷铸讲成汤伐夏后，后字也写成司。司、后本一字，《说文》把左向的读为司，右向的读为后，古文字没有左右向的区别，或读为后，或读为司，我怀疑只是方言问题。”

2011年5月，国家博物馆以‘古代中国’冠名的历史文物陈列展向公众开放，将沿用七十多年的‘司母戊鼎’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引发学界新一轮争论。

2012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葛英会教授发表《商代大鼎的‘司’、‘后’之争》一文，他认为：“‘司母戊’、‘司母辛’义为祭祠母戊、母辛，改称‘后母戊’、‘后母辛’是讲不通的。”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曹定云研究员发表文章《论殷周时代“司”“后”二字形义及其区分》，他认为：“‘司母戊鼎’不可改名为‘后母戊鼎’。”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玉芝研究员发表《是“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论卜辞中的‘司’、‘毓’》一文，她认为：“商代大鼎铭文仍应是传统认定的‘司母戊’，而不是‘后母戊’，‘司’是祭祀之义，铭文是说该鼎是祭祀母戊的彝器。”

截止目前学术界对这件商代大鼎的铭文释读，在字数、字序、字意等方面仍存诸多分歧，形成后妻戊、后戊妻、后母戊、母后戊、司母戊、妻戊、姤戊、后戊等多种释读方案，涉及‘后’、‘司’、‘母’、‘女’等字符的二字或三字组合释读问题，相关争议仍属学术探讨范畴。由此可见，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后母戊鼎”替代“司母戊鼎”的称名行为，仅为官方更名，尚无确凿的学术证据证明其为符合字源与历史语境的正名。

## 2 鼎的寓意和象征

鼎最初是烹饪之器，有三足圆鼎，有四足方鼎。最早

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才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自从有了禹铸九鼎，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洛邑。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鼎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非常崇高，它不仅是权威的象征，更是国家政权和社稷稳定的标志。“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等。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和功勋。列鼎制度就是鼎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它规定了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所使用的鼎的数量和规格，从而体现了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秩序，并且死后作为陪葬品陪葬。

甚至大鼎作为刑具立于衙门口，就是用来彰显统治者的权威，让人民看到大鼎就会心生敬畏，由然肃穆。《史记·殷本纪》注引《帝王世纪》所载：周文王被纣囚禁起来，他的长子伯邑考作为人质给纣去当车夫，“纣烹为羹，赐文王”。可见早在夏商之时已有烹人之事。春秋时，烹人之事更是常见于史籍。《左传》哀公十六年冀石乞临死之前的话说：“此事克则为卿，不克则烹，固其所也。”所谓‘不克则烹，固其所也’，正说明这种事情当时常有，不足为怪。《吕氏春秋·至忠篇》载：齐湣王病重，派人去宋国请来名医文挚，文挚用激怒齐王的办法治好了他的病，结果齐王反而“以鼎烹生烹文挚”，还煮了三天三夜。不过也有一些例子是烹死人，后羿就是被家众“杀而烹之”。及至秦代，烹人之事也是多有记载。据《汉书·刑法志》，秦在用了商鞅之后，死刑中增加了“镬烹之刑”。可见烹刑在秦已被明确规定为死刑之一种。再比如《汉书·王陵传》载：王陵跟从刘邦还击项羽，项羽抓来王陵的母亲想以此招降王陵，陵母为使儿子一心跟从刘邦，“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可见王陵的母亲也是先死而后被烹。大概因为烹刑太惨无人道，所以至汉以后的官方刑律中实不见有烹刑。据《晋书·慕容超载记》，南燕慕容超曾建议恢复烹刑和车裂之刑，并且“附之条律，纳以大辟之科”，但终固“群下议多不用，乃止。”所以烹刑主要是上古时代的一种酷刑。

自汉以降，鼎的作用逐渐模糊，甚至被放到庙里开始插香祭祀，衙门口不再放置大鼎，替代它的是两旁的石狮，狮子在百兽中高贵、威严，具有王者之风，中国古代的权







贵阶层正是很好的运用了狮子在人们心中的王者地位这一特征，因此，守门石狮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权威的象征，正所谓“狮（司）威”。







### 3 基于多学科的“司母戊鼎”正名考证







本文综合运用古文字学、方言学、考据学、文献学等学科知识，从字源、方言、铭文字符训释等方面展开考证，为“司母戊鼎”进行学术正名。







#### 3.1 古文字中正反无别的字形特征







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与金文中，字符书写存在大量正反无别的案例，这一特征已得到学界共识，现列举典型字形予以佐证：







①（何）：（何父乙卣商代），（甲 2465 合 305），（後 2.22.3 合 30），（何戊簋商代晚），（前 1.47.3 合 27），（甲 2593 合 310）。







②（伐）：（史墙盘西周中），（前 7.15.4 合 65），（粹 17 合 32119），（伐觚商代晚），（伐廬戈商代晚），（1.252 合 65）。







③（干）：（甲 2907 合 199），（乙 2684 反合 9），（大孟鼎西周早），（甲 3115 合 842），（鐵 132.4 合 49），（佚 34 合 7055）。

④（并）：（甲 774 合 3357），（後 2.34.3），（戩 33.13 合 33），（乙 3429 合 738），（珠 914 合 1095），（戩 59.2 合 109）。

⑤（令）：（令·父辛卣商），（甲 2396 合 809），（大孟鼎西周早），（乙 2948 合 648），（前 5.32.1 合 19），（作册折尊西周）。

⑥（多）：（毓且丁卣商），（甲 752 合 2789），（史墙盘西周中），（麗簋商代晚期），（甲 2128 合 573），（伯多壶西周晚）。







⑦（子）：（彝子簋商代晚），（子爵商代晚），（大爵西周中期），（子父庚爵商代），（子且己卣商代），（七年趙曹鼎西周）。

⑧（巳）：（戩 33.17 合 30），（前 4.2.7 合 123），（後 2.22.3 合 30），（麗簋商代晚期），（毛公鼎），（粹 1117 合 135）。

上述字形充分证明，商周古文字书写无严格的左右向规范，同一字符的正反书写形式，均代表同一含义，这为厘清“司”与“后”的字源关系提供了核心的古文字学依据。

#### 3.2 郭璞在《方言序》中记载：“盖闻方言之作，出乎輶轩之使

所以巡游万国，采览异言，……考九服之逸言，标六

代之绝语，类离词之指韵，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风谣而区分。曲通万殊而不杂，真洽见之奇书。”《方言》中大量记载了不同地域的词汇差异，如“楚谓之、齐宋之间谓之、秦谓之、晋谓之、宋楚之间谓之、赵魏之间谓之、宋魏之间谓之、赵魏燕代之间谓之、陈郑之间曰、晋卫之间曰、韩郑之间曰”等。涉及楚、宋、陈、郑、晋、韩、魏、赵、秦、燕、代、齐等西周晚期或东周时的诸侯国。及至西周晚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礼崩乐坏，政治分化导致文字异形，邦言异读，成为古文字同源分化的重要诱因。如《方言》记载：“箭，自关而东谓之‘矢’，江淮之间谓之‘鏃’，关西曰‘箭’”。这样的体例告诉我们同样一个物体（甲 3117 合 478），被不同的邦国称名不同，但当时没有拼音或音标系统，因邦国间记录的需求，大量假借字和形声字应运而生。‘矢’为象形字，‘鏃’与‘箭’是形声字，‘侯’从‘矢’，‘矢亦声’。同理，‘司’和‘后’正是邦国异读与文字异性的产物，语言的分化，造成文字异读，加之文字异形，最终导致二者从同一本源字分化为两个字符。‘子’和‘巳’在古文字学界都公认为同源分化，这样的分化亦是由于字形异形，方言异读造成的。故‘厚’字字形逐步演变从‘子’（佚 211(甲)）→（史墙盘(金)西）→（井人·鐘(金)）→（上(2).容.35）→（说文）→厚，这样的演变更体现了古文字的声化现象，由此可推，“子”可读“巳”，“巳”可读“司”，“子”可读“后”或“厚”，故“司”与“后”读音相通，本为一字，后因方言与书写分化为二字。从语义内涵来看，“司”为司令者，“后”为诸侯，二者均含权威、统治者之意，如“后羿”“后稷”。典籍中亦有大量将“后”释为“王”的案例，充分印证其统治者内涵：

《尚书·盘庚》：“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高后’即‘高祖’，指已逝的‘先王’。

《尚书·汤誓》：“我后不恤我众”。‘我后’即‘我王’。

《尚书·舜典》：“肆觐东后”。‘东后’即‘东夷(地)之王’。

《尚书·舜典》：“班瑞于群后”。‘群后’即‘诸后(侯)’。

《尚书·说命中》：“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丕用泰也”。‘后王君公’，并列国之尹也。

《诗·下武》：“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尚书·吕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三后’即‘已逝三王’，即太王、王季和文王。

《诗·商颂·玄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孙子”。“先后”即“先王”。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夏后皋”即夏朝第十五任君主，又作“夏后昊”。

《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近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整理的清华简中，《成后》《昭后》两篇将周成王、周昭王称为“成后”“昭后”，进一步佐证虞夏商周时期，君主可被称为“后”“侯”“王”“君”“公”，后世则主要称“王”“侯”“君”“公”。金文与传世典籍中的“晋侯”“齐侯”“康侯”“郑侯”“曾侯”“鲁侯”，实则应释为“晋后”“齐后”“康后”“郑后”“曾后”“鲁后”，“侯”为“后”的假借字。如康侯丰鼎铭文（见图三）“康侯丰作宝尊”、鲁侯鬲铭文（见图四）“鲁侯作姬番鬲”、匱侯盂铭文（见图五）“匱侯作口孟”，以及《左传·隐公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有疾。五月，晋立大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史记·燕召公世家》：“哀侯二年卒，子郑侯立。郑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左传·定公三年》：“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以如楚，献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与，三年止之。”《史记·卷三十五·管蔡世家第五》：“蔡侯知之，乃献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归蔡侯。蔡侯归而之晋，请与晋伐楚。”记载的“晋侯”“郑侯”“蔡侯”等，均为“后”假借为“侯”的典型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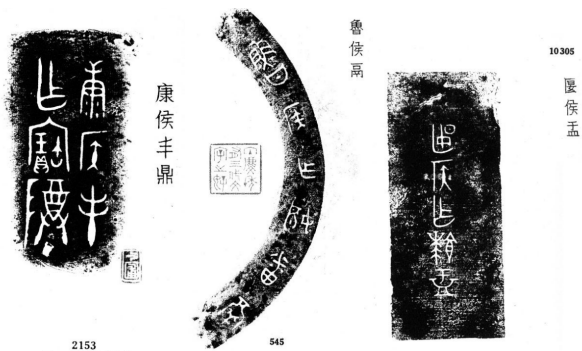


图3 康侯丰鼎铭文 图4 鲁侯鬲铭文 图5 匱侯盂铭文

综上，《说文解字》中“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发号者，君后也。凡后之属皆从后。胡口切”与“司，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凡司之属皆从司”的释义，实为许慎未见真古文所致的误读；“司”与“后”本为一字，本义均为发号施令的君主，后因方言异读与文字异形分化为两个字符。

### 3.3 铭文中的“威”重新训释，释为“威”

学界此前将鼎铭中“威”释为“妻戍”、“女戍”、“母戍”、“每戍”，均将其拆分为两个字符训释，存在明显的字源与语义偏差。《甲骨文合集》将𠄎（合 21072 一期）释作“幼”，《殷虚书契续编》则将𠄎（英 1291 一期）与𠄎（续 4.27.8 一期）释作“姪”。高明、涂白奎二先生的《古文字类编》收录甲骨文𠄎（合 21072 一期）、𠄎（英 1291 一期）、𠄎（续 4.27.8 一期）并释作“威”。为该字符的正确训释提供了关键依据。对比𠄎和𠄎、𠄎、𠄎字形，𠄎从戍，𠄎、𠄎、𠄎从戈，司母辛鼎从辛，戍和戈、辛均为刑器，置于女前有震慑、令人畏惧之意。《古文字类编》收录“威”字金文有的从“戍”，有的从“戈”，𠄎（虢叔钟 周中）𠄎（叔向簋 周晚）从“戍”，𠄎（邾公華鐘 春秋）𠄎（蔡侯申盤 春秋）从“戈”，简帛中上博简“威”字作𠄎（上博缁衣 战国）从“戈”，充分说明“威”字从“戍”或从“戈”或从“辛”字形差异，不影响其核心语义，均为刑器置于女旁表震慑、畏惧之意。

从文献语义来看，“威”的震慑内涵在典籍中多有体现，《周易·系辞下》：“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国语·鲁语》：“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竿，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皆以刑器示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战国策·齐策》：“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由震慑、畏惧，又引申为威望、声望意。

《说文解字》中：“威，姑也。从女从戍。汉律曰：“妇告威姑。”於非切。”许氏这一解释毫无任何字源与文献根据。实为误释。《释名》中“威，畏也，可畏惧也”的释义，才符合“威”字的字源与语义内涵。据此，本文将鼎铭中被拆分为“母戍”的字符，正名为单一字符“威”：该字从戍从女，女亦声，核心本义为震慑、令人畏惧，而“委”字从禾从女，女亦声，正是“威”字从戍从女、女亦声的最佳字形佐证。

## 4 结语

综合多学科考证可知，“司”与“后”本为一字，二者的读音与字形差异，实为商周时期方言异读与文字异形所致，正如唐兰先生所言，读“司”或读“后”仅为方言问题。商代大鼎铭文中，原被释为“司（后）母戍”的内容，实则应释为单一的“后威”或“司威”，因此该大鼎应正式正名为“后威鼎”或“司威鼎”。

从鼎的历史内涵与铸鼎初衷来看，该鼎的铸造目的并非学界此前认为的祭祀之用，而是为了彰显“后”（君主）

的绝对权威，以鼎的象征意义实现“以鼎威民”的政治目的；古人铸鼎的核心诉求为歌功颂德或彰显统治者权威，鼎的祭祀功能与陪葬属性，均为后世赋予或衍生的功能，并非其原始铸造意图。

本次考证为“司母戊鼎”作出的正名，不仅厘清了古文字中“司”“后”“威”的字源与语义关系，更还原了该商代大鼎的原始政治内涵；同时也为古文字铭文考释提供了跨学科的研究思路，即结合古文字学、方言学、考据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知识，回归历史语境与字源本质，避免单一学科的片面解读与字符拆分的主观误释。

#### 参考文献：

- [1] 邵慎之.《安阳探古 殷代祭器出土记》《申报》1946-10-27(3).
- [2] 张凤.《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中央日报》1946-11-17(10).
- [3][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7月,第一八四页.
- [4][汉]杨雄撰,[晋]郭璞注《方言》,中华书局,2016年6月,方言序第一页,第一〇四页.
- [5] 金祥恒.《释后》《中国文字》第10期,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研究室,1962年12月,《释后》一~九.
- [6] 于省吾.《殷司母戊铜鼎》《文物精华》第三集,文物出版社,1964年11月,第39页.
- [7] 丁骥.《说后》,《中国文字》第31期.
- [8]《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考古》1977年05期.
- [9] 葛英会.《商代大鼎的‘司’、‘后’之争》,《殷都学刊》2012年第1期.
- [10] 曹定云.《论殷周时代“司”“后”二字形义及其区分—兼论“司母戊鼎”不可改名为“后母戊鼎”》《殷都学刊》2012年第4期.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玉芝《是“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论卜辞中的‘司’、‘毓’》.《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01期.
- [12]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 [13]《殷周金文集成(增订修补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 [14]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09月.
- [15] 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中华书局,2024年5月第2版.
- [16]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01月第1版.
- [17] 宋朱熹集传《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07月.
- [18] 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艺文印书馆,1970年.
- 作者简介:李保富(1975.04-),男,汉族,山西广灵人,字耒堂,号甸顶山人,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古文字考释、方言、音韵学.